

我四岁发蒙，一生都在学习。不过只有到了19岁，我才把学和思合在一起，才有了较大长进。

我一生都同“学”这个汉字有着紧密关系。1955—1961年在北京大学读书；1961—1978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3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四个单位都有一个“学”字。

我记起《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根据我半个世纪的体认：学和思要恰当地结合起来。学而不思，不妥；思而不学，也不好。学和思合在一起才是两条腿走路。

常常，我们自以为这是自己的

是条后山路，自山脚下的教学楼转三个弯，尚有长段的直行道，一路就通了后门出口。

路边皆银杏。树干粗壮挺劲，是有年头的树。她俩一周差不多四晚走这条银杏山路。

银杏还枯着枝干时，她从南方来到异乡的北方，住在后门拐弯往前一二公里的小山上，这里是一片居民区，错落着老式公寓或小院，路边种着杜鹃，院子

写《上海女人》？有五六位作家朋友一致推荐，非马尚龙莫属。在文新大楼43层的顶层咖啡座，文汇出版社总编桂国强先生这么对我说；同座的老朋友、责任编辑朱耀华先生也是嘿嘿笑着附和。这些年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有关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文章，对上海女人的观察和判断，我是有些心得的。

对“上海女人”的联想似乎已经很完整了，给“上海女人”的画像似乎也已经很清晰了，关于“上海女人”似乎就有了教科书一般的定义，尤其是在一些时尚式的怀旧中，上海女人渐渐成为一种模式被固定下来：旗袍，嗲，作，咖啡，搓麻将，跳舞……好像上海女人就必须是这样。曾经有一位不谙上海生活的外地朋友，接受了模式化上海女人的信息传递，下结论说上海人这一百年里都是穿羊毛衫的，因为上海女人是不会结绒线的。

有许多有关上海女人的联想和画像，肯定是很不准确很不正确的，甚至就是很不准确很不正确的，上海女人在被误读，上海女人和上海的女人，应该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经常不是。最主要的大约就是上海女人的优雅和闲适在被失当地放大，以至于真正属于上海女人的特质常常被忽略不计。当然也会有反向的联想和画像。如果说旗袍是上海女人优雅的象征，那么穿了睡衣满街跑恰是上海女人庸俗的写真，尤其是在旗袍和睡衣同属于上海女人的专利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推理论在旗袍和睡衣之间的生活逻辑关系，在睡衣和弄堂之间的生存因果关系。

我写《上海女人》的冲动，就是来自于对不准确的“上海女人”的辨析和对准确的“上海女人”的还原。我想要还原的，是上海一百年历史对上海女人的外动力，是上海女人自身的内动力，是上海女人与上海男人之间的互动力。这既是抽象的背景，也是具象的生活空间。比如，所有的地域都会有贫富的差别，唯独上海会以上只角下只角来界定，上海女人的命运就在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徘徊，上海女人的运就在黄浦江苏州河中流淌，上海女人的生态、心态、姿态、形态，就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发育。

身为上海的男人，我是上海女人最近距离的观察者。我把感受发在了自己的博客上，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惊讶于我的观察、我的记忆，惊讶于我对上下几十年上海的融会贯通；在书稿完成后，甚至我都惊讶于自己，在几个月内怎么就汇聚起这么多的上海女人点点滴滴的细节。唯一的解释，因为上海女人让我怦然心动。

有人说我是老克勒。我当然不是，无论是老克勒所需要的年纪，还是老克勒所需要的殷实家境，我都远远的不配。只是在淮海路居住了几十年，略有所见所闻所想罢了。至于我在看得到老克勒的时候，仅仅是小赤佬而已。这一点不是自谦倒是得

意，因为老克勒看到的是老克勒自己，小赤佬看到的是所有的人。

请阅读一篇《倾听黑与白的撞击之声》。

学和思

赵鑫珊

一大发现。多读了古今中外的书，才知道别人（比如古人）早就讲过了，而且很透彻。无以复加。

关于学和思的相互关系，孔子的说法很精辟、到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即蒙蔽，这里有茫然的意思。殆，即危险，这里有殆尽的意思。

仅靠自己一个人去苦思冥想，不学习古今中外的经典，是走不远，极有限的。一个人要想有创新、突破，一定要同古今中外的

经典交流、撞击。

因为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孔孟和老庄，流淌着唐诗。那是我们的DNA元素。

21世纪是全球各种文明对话的时代，我们中国拿什么文明去跟世界其他民族进行文明对话呢？

不用说，儒释道、古诗词、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传统建筑和绘画，还有中医才是我们的主体。只有牢牢拥有、握有和坚守这个主体，我们在对话中才能处于平等地位，既不高傲，也不自卑，更不会慌乱，手足无措，丧失自我，或自文明席卷，不知东南西北。

在对话中，只有这种姿势或姿态，我们才能从别的文明中吸取养料，做到新陈代谢，壮大自己。



银杏

龚 静

里探出绿汪汪的柿子树叶。她住的那幢公寓楼背山而建，仅一条小路通向外面，倒是绿瓦红砖墙，只是颜色灰旧，四十多年房龄的老房子了，屋子里壁纸发黄发脆，一层叠着一层，是临时涂脂抹粉应付一阵的意思。塑料地板翘起可疑的内部，常有虫子出来探头探脑。就这么应付了一年又一年。

公寓到学校坡路一弯又一弯，最后的那道高坡像是从山上泻下来的劲瀑，每天来回，气喘吁吁是小事，几年不犯的心脏早搏却与高坡一起气势袭人。

不过，她常常开车送她，高坡变成了单程的行走，银杏道就成了夕阳乃至夜晚的相见。

山路其实并不长，她时常有意开得慢些，为了起看看山下的景色。远山，电视塔，错落铺展的房屋人家，还有夹杂的树，薄暮里总是带出既日常又仿佛非现实的气息，似乎远离了白天的尘烟。秋天，飘落的银杏叶给山路镶嵌了花边，普通的路也染上了诗意图，即使常常走过，竟也是欣然。有时晚了，山下灯火点点，教堂顶上的红色十字架闪烁其间，树色暗成沉默的夜颜，她更是让车缓缓地，若散步般。一旁的她了然她的心意。她知道，每一天的经过、看，其实都是在远离。回去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其实，对于长年在此的她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远离呢。银杏年复一年地嫩绿而金黄，枯萎，等待下一个季节的生长。我们和它们的相遇，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片刻。

她对她说，感受当下，才是要紧。

是啊，在这里十年了，都没好好看过这些树，只是在为生活奔波。握着方向盘的她感慨。

十年前与一份感情来到这里，韩语专业的她沟通没有问题，但终究是异地，丈夫常常晚归，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家庭主妇，于是，奔波几所大学兼课，读博士研究生班，经济的独立是其一，身心的托庇更是重要。只是随着孩子的出生成长，兼顾工作家庭的身心更加疲惫了。也曾经许多次地想过，不干了，就好好照顾家庭吧，然而，在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挪移交互，是工作的快乐，被学生需要的快乐，自我生长的快乐，还是难以割舍。

只是，婚姻久了，激情总是消退成记忆的背景，抚育孩子成为同一屋檐下的主题，情感的生长难以叠成千重的翠樾。内



心似乎也有意平淡深处的期待，生活一切正常。然而，总有一些时刻涟漪起、波澜泛，薄暮时，秋风里，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

一次，停了车，一起走走。她望着落叶翻卷的银杏树，白天自信干练的眼睛迷离落寞。“似乎，我们并不缺少什么。但还是会感觉缺少什么。”无论何种生活境遇层面上的人生，都有各自的缺失和遗憾。一旁的她明白，握一握她的手。她们都明白，体面职业，丰足日常，这些只是生活的表象。曾经因为缺失而追求，但得到却依然缺失。惟有心的安宁，才是全然。

最后一次散步，她捡起路边的银杏叶，一片给了她，一片留在宿舍桌子上。

离开的那天傍晚，整理行李，她想了想，还是把已然干枯的银杏叶放入随身包内。

是年末，msn上，她说，又开车去了后山那条银杏路。叶子都掉光了。

在长兴岛的风俗里，人死去的时刻，天雨时节突然放晴或者连续晴天，暗示逝者一生正气，为人大方；如果天有落雨，或者阴雨绵绵，泛指逝者生活节俭，为人谨慎。再有雷电轰鸣暴雨如注，说明逝者一生坎坷，难以瞑目。

缸缸因为事故死去的时候，是农历七月火一样燃烧的时节，万里晴空里没有一丝云彩，没有风，同事们依据岛上的风俗，将缸缸送回家，一辆黄色的工程车在乡间的公路上飞驰，卷起的泥土在空中久久不散。

缸缸到家了。缸缸年迈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瞬间昏死过去了。

西北方向的天空里，有一团黑云在腾升膨胀，只是刹那间，黑云罩住了缸缸家的上空，犹如夜幕降临，震耳欲聋的雷暴宛若铜脸盆砸在门口的石板上！闪电里，豆大雨点打在瓦片上，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整个房屋像船一样摇动着。

就因为晴天霹雳，方圆几里范围内的人相信了缸缸遇难的事实。邻居们有的围在缸缸的身边，有的站在屋檐下，他们惊愕地望着天空。

缸缸的母亲木然走到院子里，她仰起脸，喊：“我儿子，是、个、好、人——！”

邻居们纷纷站到院子里，站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事倒是无法用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的。例如，民主和效率的关系，思想界已论述得淋漓尽致了。不外是：既要发展民主，又要追求效率，二者不可偏废，特别是不要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追求效率。然而，近代以来，有大量通过不甚民主的手段却实现了合理目标的事例。对这些民主的例外，批评、否定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现实生活却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因此，我们在研究事物的必然性时，也不能忽略事物的偶然性，关注民主的普遍价值时，也莫忘民主的例外。只有这样，才能尽显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本来面目。

说到民主的例外，德国19世纪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可谓典型一个。列宁说过：“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的进步事业。”（《列宁全集》第2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具体地说，俾斯麦是以违宪的方式和解散议会、践踏民主的方式，完成了近代德国的民族统一大业的。

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同，欧洲是在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的近代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形成于17至18世纪，法国紧随其后，较晚的是德国。19世纪初期的德国有34个主权邦国和四个自由城市。他们在统一问题上各自心怀鬼胎，难有成效。而法国、俄国、英国等强国则打心眼里不喜欢德国统一，自古以来都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呀！

相对而言，德国诸邦中最有能力统一德国的是普鲁士。但谁来领导普鲁士来进行这场伟大事业呢？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较之容克贵族更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理应由它担当此任。然而现实的它却一方面惧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贵族打压自己，不愿依附于他们去统一德国；另一方面又不敢与工农结盟，发动革命，将容克从政权中赶出去。1861年威廉一世登上台后，打算加强被王室掌控的正规军建设，资产阶级害怕容克借助常备军压制自己，于是便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否决了威廉一世关于军队改革的全部预算。威廉一时不知所措，正是在这个关头，陆军大臣罗恩向国王推荐了俾斯麦。

俾斯麦出身于一个容克贵族家庭，他看透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强大的恐惧，远甚于对国王和容克贵族的担忧，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统一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叽叽喳喳就会嘎

然而止。因此，俾斯麦当上宰相的第一周，便在议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从此，俾斯麦以“铁血宰相”而闻名。

俾斯麦毕竟是学过法律的人，他在当时的宪法中找到了可钻的空子：怎样处理国王、议院的意见分歧，宪法没有作出详细规定。但国家机关不能因此而停止运转，所以国王应该有权填补这个宪法漏洞，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这就是俾斯麦的宪法漏洞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俾斯麦对众议院否决的军队改革的预算方案照行不误。

凭借工业革命所取得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过改革而建立的强大武装，普鲁士1864年10月打败了丹麦，1866年7月战胜了奥地利。俾斯麦以这些骄人的战功向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证明：过去你们梦寐以求却又无力完成的事情，今天由我俾斯麦做到了。于是整整被资产阶级骂了四年的俾斯麦，一夜间成了他们狂热崇拜的偶像！众议院随即通过一项法案：不再追究俾斯麦政府在过去四年未经众议院批准的一切经费开支的法律责任。1871年5月对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盛大庆典，统一民族德国的任务，最终由俾斯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历史风云，揭示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运用民主和抓住机遇的冲突。无数事实早已证明，民主是决策的最好手段。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机会）成本。因为真理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说服引导、典型示范和利益博弈，才能为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形成一个正确的民主决定。而机遇却往往稍纵即逝，容不得你旷日持久地进行协商说服工作。俾斯麦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说：“当民众真正理解应该干什么的时候，通常可以利用认识的时机已经过去。”并非历史上所有的个人专断都是由此产生的，但这种因民主的时间成本与抓住机遇的冲突而产生的专制性决策，却并不绝于史。

学者永远追求最好的政治艺术，而操作者有时却难免只求次好的政治选择。让我们在永不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的同时，对过去的民主的例外给予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并对今后如何抓住机遇设计一定的制度空间，努力地实现践行民主和抓住机遇的统一。

这天下午，赤脚医生说来根老伯是盲肠穿孔，十分危险。来不及扎担架了，缸缸背起老伯就往凤凰镇的医院里跑，二十里路缸缸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将老伯放到手术台上后，缸缸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嘴里吐出了大口的鲜血。今年，缸缸只有二十岁。

缸缸是个好人。改革开放后的一年，缸缸外出到城里打工，这天他揣着一年的打工所得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上，正在为得重病的女孩募捐，缸缸听完了介绍，将1000元放进募捐箱。喇叭里是书记的声音，“这位打工的兄弟，身边只有1300元，几乎捐了一年的收入。”书记代表女孩向他鞠躬致谢。在火车上，缸缸问他的打工友，这个书记怎么知道我身边有一千三百元呢？工友指着他们工作服上的标记说，我们的老板就是这位书记的老婆。

……太阳照耀着缸缸人生最后的仪式，晴天接着晴天，出殡那天，酷暑里少有的西北风，送来片片清凉，也将纷纷扬扬的纸钱和缸缸一起，送到了蔚蓝的晴空里。

——天道酬勤也酬义，天道酬的是真正的好人。长兴岛的风俗让人相信，扬善总有厚报而施恶必定被纠，天道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周遭的自然每时每刻都在警示着我们。



天道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个健康的小学生辍学了。父亲说：识字没啥好，识理就有饭吃，父亲说的理，就是勤奋和谦让，就是别人有难时，要舍得性命相救。食不裹腹的日子里，天也特别寒冷，听到呼救声，缸缸从麦地里斜穿过去，他拨开站在河岸上的人群，跳进冰洞里，救起了六岁的丫丫。那年，缸缸只有十三岁，冰水里冻坏了十三岁少年的双脚，到他十四岁的夏天里才收住了溃烂的伤口。

缸缸是个好人。萧瑟的深秋是长兴岛收获的季节，在北滩新开的稻田里挑稻回来，缸缸看到了来根老伯额头上的汗，硬把两担稻谷为一担，挑到了生产队仓库里。就在